

# 先秦时期瓦当中的兽面纹与人面纹

洪 梅

(中国国家博物馆考古部 北京 100006)

The animal and human-headed design patterns are the most characteristic during Pre-Qin period. This paper explains the changing mode of animal-headed design patterns through the origin of animal patterns and their combinations with other tile design patterns. It also argues th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bstract human and animal-head patterns and its background from analyzing the different and common points about these two patterns.

Key Words :Tiles Animal-Shaped Design Pattern Human-Shaped Design Pattern Pre-Qin Period

**内容提要** 兽面纹与人面纹是先秦时期非常有特点的瓦当图案。本文通过对兽面纹的来源、分类及兽面纹与其他瓦当图案组合的研究,阐明了兽面纹演变过程中的简化规律。并通过分析兽面纹与抽象人面纹的异同点,以及二者在发展演变规律上的一致性,论证了抽象人面纹与兽面纹之间的承继关系及这种变化与当时历史背景的关系。

**关键词** 瓦当 兽面纹 人面纹 先秦时期

**中图分类号** K876.3

**文献标识码** A

瓦当作为中国古代建筑中的重要构件,对整座建筑有着护椽防雨的实际作用,同时也起着重要的装饰美化作用。瓦当自其出现以来,其形制变化并不大,但瓦当的图案则因地区的不同而有区别,而且随着时代的变迁还常常发生显著的变化。同时期不同地域内的瓦当图案的异同可以反映出不同地区的文化特点,而同地区不同时期瓦当图案的变化又可反映出该地区建筑文化的时代变迁,故而对瓦当图案的研究是古代建筑与艺术研究中的重要课题之一。

先秦时期瓦当的形制有圆瓦当、半瓦当和大半圆瓦当三种。其中最多见的是半瓦当,而圆瓦当与大半瓦当数量较少,多出现于战国秦故地。瓦当的图案则大致可分为几何图案、花草图案、动物图案、人物图案及面部图案等若干类。其中面部图案又可分为人面纹和兽面纹两种,兽面纹数量较多,人面纹较少。人面纹按其对人面描绘的象形程度

又可分为具象人面纹和抽象人面纹两种。具象人面纹对于五官的描绘非常形象,且富于表情,很容易确定为人面纹,但这种瓦当非常罕见。而瓦当中的抽象人面纹对于五官的描绘较为抽象,与某些兽面纹形态较为接近,导致一些瓦当研究与著录书籍中常将二者相互混淆,或不能将一些人面纹分辨出来而混入到别的纹样中,有鉴于此,笔者拟对先秦时期瓦当中的兽面纹与抽象人面纹进行对比分析,以期对先秦瓦当的研究有所促进。

就目前所知,瓦当上的兽面纹出现于春秋中期,战国时期数量较多,目前发现地相对集中的有河北易县的燕下都和河南洛阳中州路等遗址。

战国时期瓦当中的兽面纹,有些直接来源于商周青铜器上的兽面纹(或称饕餮纹),还有些是在青铜器兽面纹的基础之上稍加变化而形成的。青铜器上的兽面纹按照有无身体,可分为“有首无身”与“有首有身”两大类。由于先秦时期流行半瓦



图一//

当,受其形制限制,所用的主要是“有首无身”类的兽面纹,兽面主要由眼、口、鼻、耳、角等几部分构成。而根据角的不同形状,瓦当中的兽面纹又可分为两型:双夔角兽面纹(图一:3)<sup>[1]</sup>与牛角兽面纹(图一:6)<sup>[2]</sup>。

双夔角兽面纹来源于商周青铜器上的双夔角形兽面纹。我们可以从殷代晚期的方彝、妇好墓出土的小方缶和双夔兽面纹瓦当看到这种承继与变化的关系。方彝正面所饰兽面纹的角即为一对横列的夔,相对而立(图一:1)<sup>[3]</sup>。妇好墓的小方缶腹部所饰兽面的双角是一对背向倒立的夔(图一:2)<sup>[4]</sup>。瓦当上组成兽面双角的亦是一对背向倒立的夔。其与方缶、方彝的区别仅仅是:方缶上夔的身体向中间卷曲而瓦当上夔身体向两边卷曲展开,方彝上的夔身体伸展方向虽同,却为正立。

牛角兽面纹,来源于青铜器上的牛角型兽面纹。从以下两件商代晚期的兽面饰中我们可以清楚看到,兽面的两角两端均高高翘起,前者的吻部突

出,两颊内收,下半部与半瓦当相似(图一:4)<sup>[5]</sup>;后者两角中部的簠形饰突起呈山形,更与瓦当中兽面纹两角间的山形纹相一致(图一:5)<sup>[6]</sup>。

战国时燕瓦当中的兽面纹中还有少量的铺首纹(图一:7)<sup>[7]</sup>,来源于同时期青铜容器上的铺首(图一:6)<sup>[8]</sup>。

除了以上三种直接来源于青铜器兽面纹的瓦当兽面纹,还有一些兽面纹在此基础上又略加变化,从而形成了瓦当上特有的兽面纹形式。笔者以为可分成如下三类:

(一)山形兽面纹。由兽面纹通过突出、放大其兽面中间的簠形饰,使之成为整个兽面纹的轮廓和背景,与兽面纹组合而来。山形纹从上到下,占据了瓦当的内缘,兽面被包围在山形轮廓内,兽面的形状也受其影响,眼角略下垂,并且没有兽角(图二:1)<sup>[9]</sup>。

(二)云纹兽面纹。由卷云纹与兽面纹组合变化而来。卷云纹原已存在于兽面纹的周边,仅起装



图二 77

饰作用,但通过对卷云纹数量的增加、形状的变化,而产生了一种由以云纹为主体或干脆以云纹构成兽面纹的新的兽面纹形式。这种兽面纹有一定的地域特点:如在河北易县的燕国故地,出土的卷云纹兽面纹半瓦当,兽面纹的菱形眼和阔嘴形状未变,保留了兽面的基本特点,但双耳由卷云纹构成,横卧双眼之上,倒类似于眉毛。双角也简化,由一朵小云纹替代,立于双耳之间。使之看上去,形象华丽而柔和(图二·2)<sup>[10]</sup>。河南省洛阳的东周遗址中云纹瓦数量非常大,与之共出的还有另一种简单的图案化的云纹兽面纹瓦当。直接利用变形的勾云纹卷曲的线条内曲构成兽面的眼和面部轮廓,再利用另外的云纹来做嘴,以T形纹为鼻,构成一个兽面(图二·3)<sup>[11]</sup>。或者将两个半个勾云纹下端连在一起,仍是末端卷曲成眼,中间较宽处形成鼻梁,中间下部连接处为嘴,构成另一类型的兽面(图二·4)<sup>[12]</sup>。

(三)几何线条兽面纹。由几何线条构成的图案化兽面纹是兽面纹的另一种变形。陕西眉县第

五村乡成山宫遗址出土的兽面纹瓦当,由线条硬朗的泥条构成,图案简洁对称,保留了兽面纹的基本构型,大眼睛、耳朵和双角的位置相对不变,没有刻划嘴,同时也去掉了所有装饰性的图案。并且与其它地区兽面纹不同的是这种瓦当图案的五官是阴文表现的(图二·5)<sup>[13]</sup>。

除了复杂多变,瓦当兽面纹还与其它纹饰如双兽纹、树木纹、几何纹等通过组合形成更为复杂的复合兽面纹。如:

其一,树纹兽面纹。由树纹与箭头纹、乳丁纹、云纹等组合而成(图二·6)<sup>[14]</sup>,有些研究者称之为树木双目纹。这类瓦当多发现于山东临淄齐故城。以兽面为原型的兽面纹半瓦当在这里很少见,但笔者认为这类所谓树木双目纹也是一种兽面纹。因为这种图案虽以树纹为主,但树的左右最低枝分别下垂,围于左右对称的乳丁纹之上,形成眉毛,而树下的卷云纹更是形成了硕大夸张的两个鼻孔,这样就具备了面纹的基本要素。树纹恰位于眼眉上方的中间,也可看成额头。另外还有一种更为简单的图案,只有树纹与目纹,仅表现额头和眼睛的简化的兽面纹(图二·7)<sup>[15]</sup>。

其二,四兽兽面纹。目前仅见一例。当面上端两兽对卧,曲颈回首相背,兽身盘曲而成卷云纹,作为兽的双角,其下为菱形双目。双目之间以“介”形纹为鼻。另外二兽分卧于当面左右两下角,前身向上,前腿向上抬起,后身伏地,驮起兽面纹的双眼,卷云纹形成的尾部,又兼作兽面纹的阔口(图二·8)<sup>[16]</sup>。

其三,三角双螭兽面纹。以凸三角纹为地,双螭由中央各自左右曲身回首,低首竖角,作对峙状,形成兽面的双角。其下为椭圆形双目,二目之间以一条竖凸线为鼻梁,变形云纹为口(图二·9)<sup>[17]</sup>。

这些先秦时期瓦当上的兽面纹与同时期的云纹、山形纹、树纹、几何纹等其它瓦当图案有着多种组合变化,但在各种繁复的变化组合之中,却都遵循着一个原则:简化原则。

我们可以看到,战国早、中期直接取材于青铜器兽面纹的兽面纹瓦当中,充当兽角的双夔纹还在兽面纹中占据着瓦当中整个上半部的重要的位置,所占面积也很大,有时甚至超过一半的高度。而在其后出现的云纹兽面纹、山形兽面纹中,眼睛的高度有所增加,多数都超过了瓦当一半的高度。而且,卷云兽面纹在早期还有部分瓦当只是用卷云纹替代了双夔的位置,用变形云纹来表现兽面





图三 //

的耳朵、鼻子,画面中,兽面纹仍占主导位置(图三:1)<sup>[18]</sup>;而后期的多数卷云兽面纹,卷云纹虽仍散布于兽面四周,但双耳、鼻子已都很难看出原有的形状(图三:2)<sup>[19]</sup>,却仍着力表现了兽面的巨睛、阔嘴和獠牙。还有些卷云纹兽面纹,兽面纹的双角、嘴、双耳各部分也都是用变形的云纹表示,不同的是云纹在纹饰中起主导作用,整个当面几乎都被云纹填满,只有兽面纹的眼睛为椭圆形的块状凸起,呈现出兽面纹的特征(图三:3)<sup>[20]</sup>。还有些瓦当,云纹的布局与前同,但连眼睛都由卷云纹来表示,兽面已完全淹没于云纹中,难以辨认(图三:4)<sup>[21]</sup>。

河南洛阳地区的卷云纹兽面纹在构图上较为简单,有的也是直接用变形的云纹构成兽面的眼、嘴和面部轮廓(图二:4、5)<sup>[22]</sup>。另外也有类似于燕下都的云纹兽面纹,菱形巨睛的形状基本未变,用

勾云纹来替代兽面的角、鼻梁及耳朵,甚至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简化、变形,省去了角旁边表示耳朵的小卷云,代表角的勾云纹也变形成为眉毛和胡须(图四:1、2、3)<sup>[23]</sup>,成为抽象人面纹的前身。

山形兽面纹可分为两类:一类与卷云兽面纹相似,失去了双角和双耳,保留了阔嘴和獠牙(图二:2)<sup>[24]</sup>;另一类牛角兽面纹则保留了兽面的双角,而失去了双耳,保存了吻部和獠牙(图二:3)<sup>[25]</sup>。而三角双螭兽面纹发现得较少,在与三角双螭纹组合的过程中保留了上扬的双角,而丢弃了兽面的双耳(图三:5)<sup>[26]</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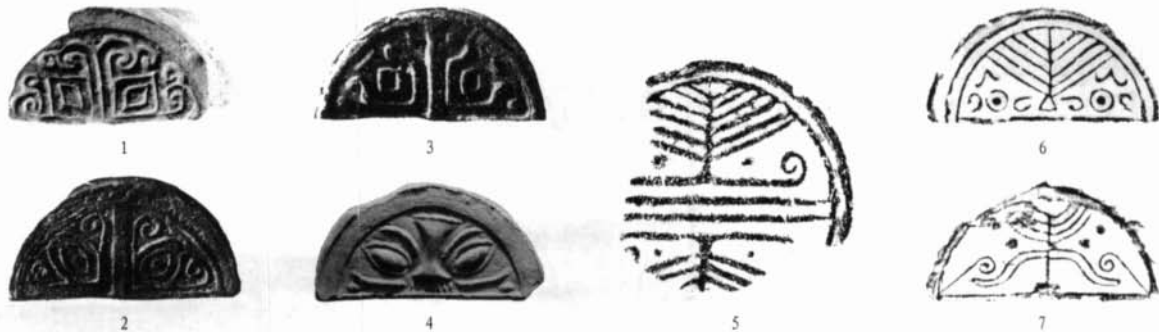
铺首兽面纹,保留了眼睛、双耳及吻部的轮廓,丢弃了双角(图一:7)。

山东临淄齐故城所出的树木兽面纹,以树木纹为额头,以箭头纹为眉,以乳丁纹为目,构形简洁,丢弃了兽面纹的角、阔嘴以及耳,唯一夸张表现的是兽面纹的鼻子,以一个较大向下卷曲的云纹表示,形似猪鼻(图三:6)<sup>[27]</sup>。

综上所述,各类兽面纹在与其它纹饰进行组合的时候,因组合纹饰的不同均丢弃了一些兽面纹的重要特征。其中,最先舍弃的往往是角或耳朵,其次是鼻、嘴。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角或耳朵退化的同时,在眼睛的上部出现了眉毛(图三:2、6)。

抽象人面纹瓦当至迟出现于战国晚期。燕下都的郎井村13号作坊遗址出土的半瓦当LJ13T2②:1,杏核双目斜向上翘,长细眉微弯,额与鼻梁相连,鼻微塌,嘴两侧长胡须(图四:4)<sup>[28]</sup>,这是公认的一枚人面纹瓦当。从该人面纹的斜翘的双眼和用短线表示嘴的方式却还可以看出兽面纹的一些影子。

另外,河南洛阳出土的几枚半瓦当,则似乎正处于由兽面纹向人面纹变化的过程之中。洛阳涧



图四 //

滨出土一枚半瓦当,菱形的一对大眼睛,周围各以一对云纹围绕,既起装饰作用,是兽面的双角和鼻梁,双眼的左右斜上方,还有一对小的云纹,当是简化的双耳(图四:1)<sup>[29]</sup>。还有中州路的两枚瓦当:M1115上01的构图也洵滨所出瓦当相似,但更简省一些,眼睛也变为椭圆形,眼角斜吊,更加像人的眼睛。由于勾云纹是单线条的,较细,所以也更象人的眉毛。此瓦当省去了眼角上方充作耳朵的小云纹,而且半瓦当中间出现了起分隔作用的宽隔线,立于两眼之间,也更象是鼻梁,应该说,该枚瓦当与燕下都郎井村13号作坊所出人面纹瓦当最为相似(图四:2)<sup>[30]</sup>。而M1302上01的主要构图与前者类似,只是围绕眼睛的勾云纹形状略有差别,前二者均向内勾卷曲得比较厉害,而它是略往外勾,而眼下那两条弧线也与燕下都郎井村13号作坊所出人面纹的胡须更为相似。只是这枚瓦当的眼睛是菱形的,线条很硬,所以看起来似乎更接近兽面一些(图四:3)<sup>[31]</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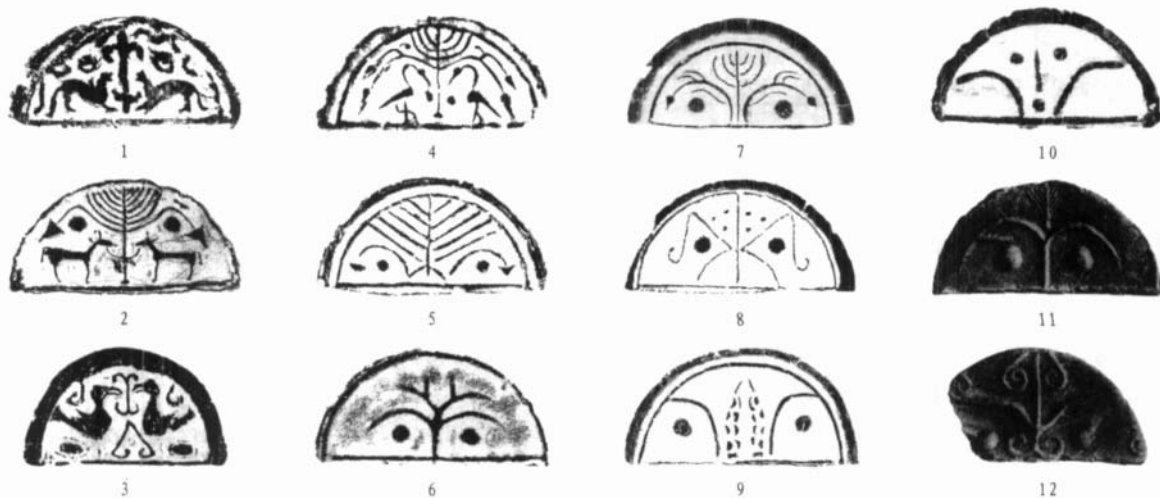
在山东临淄齐故城出土的一些树木双目纹瓦当,以树干表示额部与鼻梁,以两侧的树枝来表示眉毛,以乳丁纹表示双眼,还有与燕下都人面纹半瓦当类似的向上翘的胡须(图四:5)<sup>[32]</sup>。也有的半瓦当,树纹下,另以类似勾云纹的线条来表示眉毛和鼻翼(图四:6)<sup>[33]</sup>,更有一些瓦当,在以上基本要素的基础上,又加以变化,胡须由平直尾端上卷,而改为“八”字须,使之更加生动(图四:7)<sup>[34]</sup>。

笔者认为这些瓦当都已失去了兽面纹中作为兽性的主要特征,如角、立耳、阔口等,而形成了人

面纹特有的眉毛、胡须等,它们正在或即将变成表现人的面部五官的纹饰——抽象人面纹。

从以上瓦当图案的联系和对比中,我们可以看到,兽面纹与抽象人面纹在内容上有一定的共性,同时也有较多的差异。共性是二者着力表现的都是面部的正投影。由于从正面看,人脸与兽脸在眼、眉、鼻、口五官在面部的相对位置差别不太大,所以瓦当图案在这一点上人面纹与兽面纹的区别并不太大。二者的主要区别在于人没有角,耳朵的位置也与动物不同,动物的耳朵在眼睛上方,人的耳朵与眼睛平行。其次,兽面纹的嘴、鼻与人的口鼻形状本身就有一定的差异。由于动物的鼻子较长、较大,向前突出,所以兽面纹在表现鼻子时,或作长吻状,或对鼻翼作一定的夸张。动物的嘴相对较大,所以兽面纹中的嘴一定都很大,并且多数要露出獠牙。另外,兽面纹一般不表现眉毛。除此之外,人面纹与兽面纹的用途不同。着力表现巨角、双耳、阔嘴、獠牙等兽类凶狠的攻击性的一面,是兽面纹用以达到威吓、震慑等目的的主要方法,而抽象人面纹虽然来源于兽面纹,故而在眼睛、眉毛的形状上,受到兽面纹的影响,但由于表达的目的不同,所以,不会着力表现兽性的一面。而喜怒哀乐的丰富表情是人所特有的,在兽面纹中则只有威吓的表情,这也是区别抽象人面纹与兽面纹时非常重要的一点。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先秦时期瓦当中的抽象人面纹是兽面纹在简省变化中逐渐失去兽面的特点,同时又不断形成新的人面的特点而逐渐产生



图五//

的。

抽象人面纹是随着兽面纹与其它纹饰组合过程中而出现的,在其演变过程中,也同样离不开与其它纹饰的组合。上文已经谈到兽面纹在与其它纹饰的组合中,有一定的地方特点,这一特征也同样表现在早期的抽象人面纹瓦当中。

在双兽纹盛行的河北易县燕下都故城,也发现了双兽抽象人面纹(图六:1)<sup>[35]</sup>。同样,与双凤鸟纹半瓦当相伴出的还有双鸟抽象人面纹瓦当(图五:3)<sup>[36]</sup>。

在流行树木双兽纹的山东临淄齐故城,发现了有齐地方特色的树木双兽抽象人面纹(图五:2)<sup>[37]</sup>和树木双鹤抽象人面纹(图五:4)<sup>[38]</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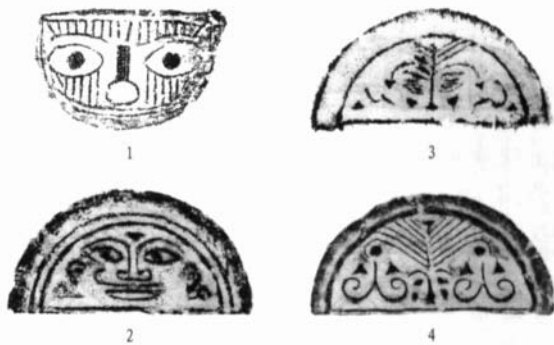
战国时期齐地数量较多的树木兽面纹,其基本图案是由典型的树木纹与箭头纹、乳丁纹构成的树木兽面纹(图五:5)<sup>[39]</sup>。与之共出的是在此基础上略加变形的树木抽象人面纹(图五:6、7)<sup>[40]</sup>。

还有一些用几何线条与乳丁纹构成的兽面纹(图五:8、9)<sup>[41]</sup>和与之共生的抽象人面纹(图五:10)<sup>[42]</sup>,从构图上看,它们也与树木纹有一定的关系。

山东济南鲁故城发现的抽象人面纹半瓦当非常少,以下两枚瓦当,其一与齐地流行的树纹有关(图五:11)<sup>[43]</sup>,另一与中原地区流行的云纹相组合,而从云纹的构形上看也与树木纹有一定的关系(图五:12)<sup>[44]</sup>,这说明鲁的瓦当可能受到齐瓦当的很大影响。

从前文的论述中,我们已经看到,兽面纹在与其它纹饰进行组合的时候,因组合纹饰的不同而丢弃了一些兽面纹的特征。而随着复合兽面纹的进一步演变,兽面的部分也进一步退化,它们丢弃了更多兽面的特征,譬如獠牙、阔嘴、斜吊凶恶的大眼睛,而变成为以眼睛、鼻梁为主要表现内容的面纹,眼睛本身线条也变得更加柔和,曾经凶恶威严的兽面纹变得具有温婉、情绪化的表情,从而最终演变为复合的抽象人面纹。所以,抽象人面纹瓦当与复合抽象人面纹瓦当不论是在构图,还是在表现手法的细节,还是组合的纹饰都与兽面纹瓦当有相当紧密的关系。

不论是兽面纹瓦当,还是人面纹瓦当,都有一定的地方特点。这些特点,主要表现在兽面纹细节以及兽面纹与兽纹、鸟纹、树纹、云纹等其它纹饰的组合变化之中,这些特点在兽面纹向人面纹的转变过程中,也一同承袭下来。即在同一地区发现



图六 //

的抽象人面纹瓦当与兽面纹瓦当表现出共同的地域特点。

另外,在时代上,兽面纹瓦当出现的时间不迟于春秋中期,而目前所发表的抽象人面纹瓦当中,则不早于战国时期,两者也有承袭的关系。

再来简单看看先秦时期的另一类人面纹——具象人面纹。前文所述,先秦的具象人面纹非常罕见。目前见诸著录的仅有河南省发现的一枚<sup>[45]</sup>:为半圆形瓦当,当径19.6厘米。圆脸,双目圆睁,张口,表情惊奇而紧张。该图案用笔简洁,大方传神(图六:1)。

在山东临淄齐故城发现了与复合抽象人面纹相似的复合具象人面纹的半瓦当。具体可分为云纹人面纹、树纹人面纹两种。前者以具象人面纹为主,在面颊处有起装饰作用的云纹(图六:2)<sup>[46]</sup>。树纹人面纹也是人面纹占据了图案面积的大半,树纹最小,但占据中间位置,人的鼻梁由树干充当,嘴部也由树根替代。与抽象的树纹人面纹相似,树的最低枝向下弯,枝头末端附箭头纹,形成了人面的轮廓(图六:3)<sup>[47]</sup>。

还有一种更为复杂的组合——抽象人面纹与具象人面纹组合的复合人面纹图案。山东临淄齐故城出土一枚瓦当,其上半部为抽象的树纹人面纹,由树纹和乳丁纹构成,下半部为一具象的人面纹,两边还附有云纹为装饰(图六:4)<sup>[48]</sup>。

山东的这三枚复合具象人面纹半瓦当,从另一方面又证明了瓦当图案的地方延续性。树纹是山东地区战国时流行的瓦当纹饰,当周边的云纹、兽面纹、人面纹等图案出现时,树纹也参与了进来,成为新纹饰的一部分。从文化整合的角度来说,就是地方文化在经历时代变迁的过程中,既吸纳了时代特点,也保留了传统特色。



先秦的抽象人面纹虽由兽面纹转变而来,并有一定的发展、变化,但它并没有取代兽面纹,成为后来秦汉时期的主要纹饰。相反,到了汉代,云纹瓦当和文字瓦当、四神瓦当等得到了大发展,成为了汉代最主要的瓦当形式,而抽象人面纹瓦当与兽面纹瓦当都几乎不见了踪迹(目前所知的少量汉代人面纹瓦当多是具象人面纹,它的出现与发展与抽象人面纹不同,另文论述)。瓦当虽是最常见的建筑构件,但它纹饰的这种演变却与时代变化有相当的关系。

从主题上看,战国时期的燕和秦的兽面纹半瓦当固然是抽象人面纹的前身,而东周的云纹瓦当,齐国的树纹瓦当,都成为人面纹瓦当的出现时的部分因素。这与战国晚期的各国长期的战争带来的文化整合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从政治环境上看,瓦当虽是古代建筑中最常见的构件,但并不是普通百姓能使用的建筑材料,它主要使用于宫殿、官署、庙堂等建筑上。故而本身也是特权阶层特权的象征。由青铜器兽面纹变化而来的兽面纹在瓦当上的大量出现,所表现的正是王权的威严。而由于战国时期长期的混战,各种学派的争鸣,周王室的衰落,也弱化了王权的神秘色彩。象征王权的兽面纹在战国时期不断简化,同时融入新的元素,与兽纹、鸟纹、树纹、山形纹、几何形纹等产生了多重组合,并且在组合中不断弱化其作为兽面的特征,只有眼睛始终得以保留,而它又在与以上这些新的多种纹饰组合中,最终又形成了新的抽象人面纹。具象人面纹瓦当发现虽少,但如前文所述,也遵循这多重组合的原则。从这个意义上说,兽面纹的简化、抽象人面纹的形成和发展也是战国时期旧的王权不断衰落,权威不断遭到挑战的产物。

从纹饰本身来说,兽面纹代表的是商周时期的神物,而树纹是齐国的祖社崇拜的产物,云纹也代表着神界,这些代表神的纹饰与表明战争的箭镞纹、乳丁纹组合在一起,所生成的抽象人面纹从一开始就反映了神在人们精神世界中的一种世俗化、生活化的倾向。人们对于世俗生活的重视,又与战国时战争频繁,人们对于安定平和生活的向往是分不开的。由不同地区依据原有瓦当纹饰加以变化或融合而形成同样的抽象人面纹的主题,也表达了当时各地人们对于世俗生活的一种普遍追求和审美的一贯性。

关于兽面纹与人面纹在复合纹饰的组合方式

上,一直保存着地方性特点,我们认为,这是地方文化在经历文化整合、时代更迭的过程中,既吸取外来文化,同时保持该地方文化传统的标志。从另一角度看,则是地方文化在这一过程中也得到了发展。

- 
- [1][2][8][9][10][16][17][19][20][21][24][25][26][28][35]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燕下都》,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29页,图一二:1;第113页,图六八:1;图版一五四:1;第318页,图一七八:1;第782页,图四四七:2;第793页,图四五五:2;图版一四:1;第741页,图四二五:2;彩版四;第73页,图四二:1;图版一三:5;图版七一:2;图版一四:1;图版二八:3;第84页,图4~51。
- [3]陈梦家:《殷周铜器图录》,1963年,第903页, A637。
- [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青铜器》,文物出版社1985年,图版三二、图一五:3。
- [5][6]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等:《陕西出土商周青铜器(一)》,1979年,图版三九、一一二。
- [7][11][12][2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中州路(西工段)》,科学出版社1959年,图版十八、十七:9、十七:8、十七:3、十七:4。
- [13]刘怀君、王力军:《偃县秦汉瓦当图录》,三秦出版社2003年,第7页。
- [14][43][44]关野雄:《半瓦当の研究》,岩波书店1952年,图版PL. XVII:47、PLXXVI. 76、PLXXVI. 77。
- [15][32][33][34][39][41]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新中国出土瓦当集录·齐临淄卷》,西北大学出版社1999年,图二三八、图三三〇、图五、图九九、图三三、图八二、图八九。
- [18]刘德彪、吴馨军:《燕下都瓦当研究》,河北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81页,图4~32。
- [23][2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报告——1955~1960年洛阳涧滨考古的掘资料》,燕山出版社1989年,图版七〇:3。
- [27][36]华非:《中国古代瓦当》,人民美术出版社1983年,第11页,图66,原称双目纹半瓦当;第7页,图36。
- [37][40][42][46][47][48]傅嘉仪编:《中国瓦当艺术》,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第761页,图1306;第739页,图1243、1245;第739页,图1244;第748页,图1270;第749页,图1272、1271。
- [38]赵力光:《中国古代瓦当图典》,文物出版社1998年,第51页,图21。
- [45]傅嘉仪:《秦汉瓦当》,陕西旅游出版社1999年,第262页,红柳精舍藏拓片。